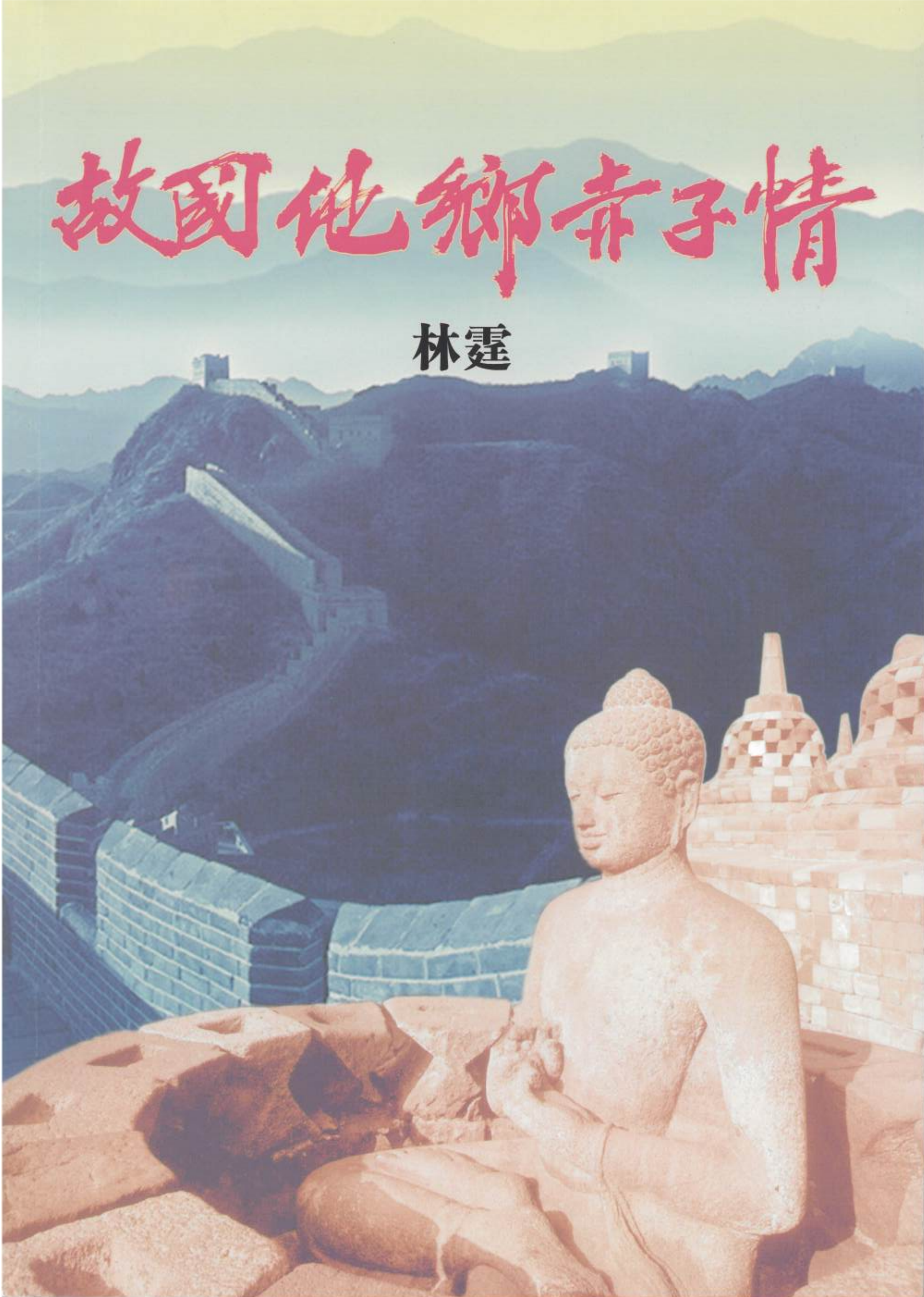
故國他鄉赤子情

林霆





林逢燈（林霆）

1933年出生於廣東省蕉嶺縣。曾在蕉嶺中學肄業。1950年在梅州師範肄業。1960年畢業于廈門大學華僑函授部文科。

1951年旅居印度尼西亞。

1953年任雅加達中善小學教師。以林彧等筆名在印尼中文報刋上發表文章。

1955年任巴(雅)城中學教師。

1960年離開巴中，受聘爲協和中小學校長室主任。

1964年辭去教職，任《首都日報》記者，文藝副刋主編。

1966年回國在蕉嶺華僑農場任文教干事。

1979年爲農場中學教師。

1980年來港定居。

故國他鄉赤子情

林霆

刘先生存念

林霆赠
21-1-2025.

[illegible]



82 歲時攝于峇厘

謹以此書

獻給

印度尼西亞“9·30 事件”中無辜被殺的印尼人民、華裔和華僑!

獻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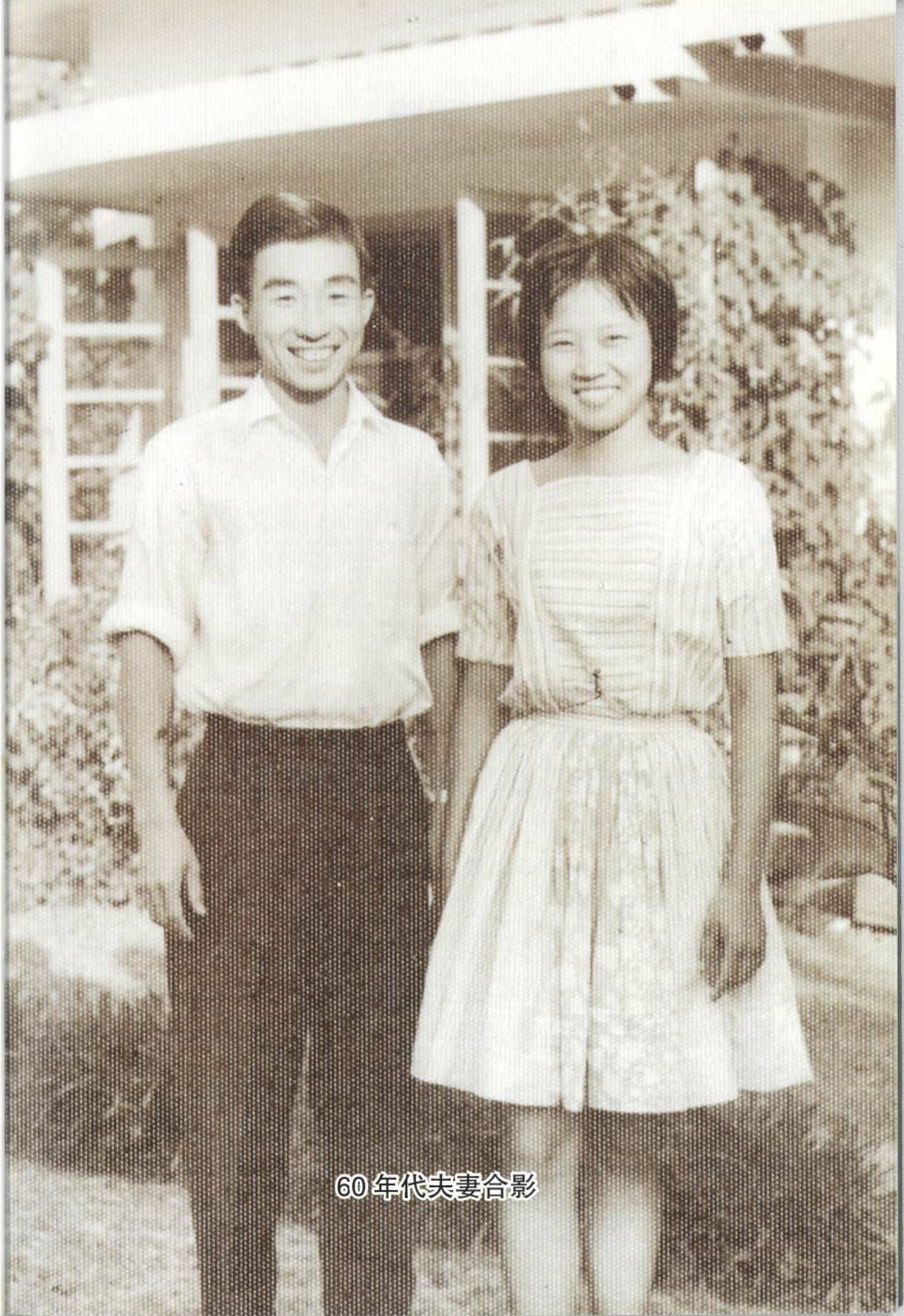
印中兩國善良的、有正義感的人們!

獻給敬愛的

方紀先生
何振樑先生
查禾多大使
杜同夫婦
張亞生先生
林瓊光先生
李勉之先生
古宣輝先生
司徒眉生先生!

獻給

我最親愛的妻子劉冬慧!



60 年代夫妻合影

目錄

引子……01

9·30 的槍聲……05

逃亡之始……09

新的开始……12

魔爪伸過來了……18

再見，印度尼西亞……21

農場的遭遇……24

出獄之後……27

可敬的前輩……31

山水有情……35

來到香港……37

我和妻子……40

现在的生活……43

引子

我生於 1933 年。出生那天，我的祖父剛好買了一盞油燈回來。當晚，我媽就臨盆了，因此取名逢燈。

祖父是一家之主，在村子里開了一間中藥鋪。他自己一輩子多病，又熟讀醫書，俗話說久病成醫，他自然成了一位醫生。他的病人都不付診金，只付藥費，加上他醫德甚好，對病人噓寒問暖，照顧有加，有時甚至贈醫施藥，因此頗受村民愛戴，是一位知名的鄉紳。

祖父是清末的準秀才，文學造詣頗高，對詩詞歌賦很有研究，寫對聯更是專長。1940 年祖母去世，祖父寫了輓聯哀悼：

七八月病入膏肓，藥石無靈嗟莫嘆。

二三子軍商在外，欲歸不得奈何如。

藥鋪對面有間屋子，約 40 平方米，堆滿各種書籍畫卷，中間還有一座關帝的塑像。這是祖父的工作室，我們稱其為“關爺廳”。

從我一年級開始，每逢暑期假日，祖父都會將我關在關爺廳里寫字讀書——每天寫 20 頁毛筆字，可真不簡單。那時用的是黃紙（質地比現在的廁紙還要差），寫完後還要背書。初時背誦的《三字經》、《增廣》,繼而是《史鑑節要》、《四書五經》。

祖父對我們甚為嚴格，寫字不好，或者背不出書，就會賞以“骨鑿”或者鞭打我們的小腿，使我又敬又畏。回

想當年，我感謝祖父的深恩。

15 歲那年，祖父去世了，全家深深陷入一片哀傷之中。送別祖父之後，我的母親極力主張我去追隨南洋的三伯父，學做生意。

三伯父從小去了印尼，除了祖父和年老的二伯母，我們都沒與他見過面。他在南洋艱苦奮鬥，努力打拼，開了蚊香廠，肥皂工廠和豉油廠，逐漸富裕起來。他很孝順父母，又關愛子侄，一家人的生活及我讀書的開支，絕大多數都是他寄過來的，他是我們家的功臣和大恩人。母親要我遠赴南洋，我一口便答應了。

於是，我漂洋過海，歷盡驚濤駭浪，看盡海上的日出日落。到了印尼的雅加達，我見到了可敬可親的伯父，還有伯母和弟妹們。當晚一家團聚，晚餐非常豐富，我也第一次嘗到印尼菜，覺得很可口。席上我們談祖父、談家人、談家鄉的人事，樂也融融。

在伯父家待了一年多，幫他訂簿記帳、清點進出貨物，有時也跟車賣貨，踏單車到偏僻小村鎮銷售蚊香。日子過得很快，但我的想法變得更快。

我開始厭惡做生意，不喜歡商業的工作，剛好一個朋友新任校長，邀請我去當教師。我和三伯父商量，他雖然不太高興，還是勉強答應了。離別時，伯父母送我一大皮箱的衣服，還給我一隻“美多”手表。就這樣，我踏上人生新的旅程，當上教師。

同時，由於我對文學的熱愛，教書期間，我開始用林彧的筆名，在《新報》、《生活報》等報刊發表文章，又參加了《印華教育》的編輯工作。

注：《印華教育》是雅加達僑總發行全印尼華校教師的教學雜誌。

我在雅加達中善學校教書 4 年後，轉到巴城中學教了 6 年，之後又轉到協和中小學做行政工作。

在這期間，使我有機會接觸印尼進步人仕，我深深贊同他們的信念和工作，使我走上一條康莊大道。



1957 年 6 月中善学校教师合影



雅加达协和中小学师生



我和两位中善学校钟维恩老师（左一）、陈顺悦老师（中）留影



我和中善学校师生留影



我和巴中学校师生留影



我和巴中师生留影

9·30 的槍聲

1965 年 4 月是著名的亞非會議 10 周年紀念的日子，既是發起國又是舉辦國的印度尼西亞政府，決定舉行熱烈的 10 周年慶祝大會，邀請亞非兩洲的多個國家政要參加，中國總理周恩來也在邀請之列。

印尼社會，尤其是首都雅加達，一片沸騰，人們興高彩烈，歡呼雀躍。為什麼？因為在 10 年前舉辦亞非會議之後，印尼名聲大噪，國際地位空前提高。印尼總統蘇加諾也成為亞非兩洲的風雲人物。

當時中印兩國關係良好。為慶祝亞非會議 10 周年，中國贈送 20 噸節日煙花作為慶祝禮物。而印尼政府也特別派出一架大力士運輸機到廣州接載煙花。

《首都日報》派我隨印尼空軍代表團前往。

到廣州那天，天空烏雲密佈，飛機在上空盤旋了一個多小時仍然無法著陸。機長是一名空軍少校，他有點著急說："如果不能降落，就轉飛河內吧！"接著把我叫進駕駛室說，地面傳來的英語，聽得不很清楚。要我用普通話和他們聯係。我戴上耳機清楚地聽到指揮塔傳來："向西向西，向西飛"的普通話，我立即轉達給機長。不多久，飛機在搖晃中安全降落。只聽見指揮塔傳來一陣贊揚之聲："很好，印尼空軍很勇敢。"

幾天之後，大力士運輸機，載著滿倉的節日煙花，載著滿瀉的中國人民之盛情和友誼，回到雅加達。



1965年4月17日晚間，印尼總統蘇加諾在首都雅加達舉行盛大國宴，招待前來參加萬隆會議（第一次亞非會議）10周年慶祝活動的亞非貴賓。這是周恩來總理、金日成首相、西哈努克親王等在宴會上。新華社記者 杜修賢攝

燃放煙花的日子，雅加達像煮沸的一鍋水炸開了。燃放煙花的地點，四圍人山人海，水洩不通，有的攜男帶女，有的闔第光臨，除了首都的華僑（據統計當時雅加達華僑約10萬人），四周小市鎮，如加拉横、勿加西、巴剎明姑和衛星市鎮，如茂物、蘇加巫眉和展玉等華僑都來了，他們說已幾十年沒看過煙花了。這是首都一個盛會，也是印尼華僑的一個盛會。把中印兩國的關係推上一個高峰。

但是盛會之後，情況有所改變，首都的氣氛變得有些緊張，社會上不斷有些流言，說將軍委員會要奪蘇加諾總統的權，謀害總統；又有傳說印尼共產黨支持蘇加諾，對抗將軍委員會，要有所行動……等等。謠言四起，莫衷一是。

印尼的社會矛盾一發不可收拾。

1965年9月30日深夜，印尼首都雅加達響起密集的槍聲，以蘇加諾總統衛隊，翁東中校爲首的軍人，槍殺了7位將軍，包括陸軍司令、海軍司令、警察總長等軍頭。國防部長納蘇第安中將幸免于難，但被打跛了腿。這是一宗震驚全國以致全世界的事件："9·30事件"。



軍方煽動暴民打砸搶並燒燬共和大學

軍方一時措手不及，給打亂了陣腳。但畢竟強弱懸殊，一俟軍方清醒過來，立即反撲，進行全面大搜捕、大清洗。翁東中校即時落網了，所有參與者一個個被捕。印尼共產黨被指參加兵變，遭到了大追捕。我的許多印共的朋友失踪了，而且是一家一家，從人間消失，這是一個殘酷的大屠殺！



大屠殺的血雨腥風很快就波及華僑。華校被封閉了，華文報紙也被禁刊了。有許多華僑也被殺了。屢遭排斥的華人惶惶不可終日 。

我當時是雅加達《首都日報》的一名記者。



囚犯在薩倫巴監獄勞動

印尼華文報刊跟隨祖國的脈搏，多數是愛國的；印尼的記者，在一個以查禾多為首的亞非新聞工作者協會中，經過多年耕耘，有許多是進步的。“9·30 事件”發生後，記者變成被追捕的對象，許多記者被迫害。我也只好離開報館，離開首都雅加達。開始我的逃亡生活。



攝于60年代

逃亡之始

《首都日報》被禁之後，編輯部召開緊急會議，安排善後工作。最主要的是有三位同事要暫時離開。社長司徒眉生（與蘇加諾總統關係密切，人們稱他為總統義子）要立即離開首都；還有應該走的是我和總編輯林瓊光先生。

最初總編輯林瓊光先生提議我去蘇門答臘，說那邊的報館可以接應我。但我考慮到路途太遠，呼應困難，再說人生路不熟，所以沒有接納。後來才決定去萬隆。

萬隆離雅加達 180 公里，當時需 4 小時車程，那邊有親戚和朋友，可以互相照應。

我回家收拾簡單行李，準備上路。但是我知道“離家”這一關是不好過的。我愛我的妻子和 3 個孩子，第三子尚在繈褓中。今天一別，何日重逢？



1967 年妻子带着三个儿子留影

看到我拿行李，大孩子林松（當時他只有兩歲）就纏上來了，“爸，我也去。”第二的孩子林華（他才一歲大）也湊過來了。安撫孩子之後。我對妻子說，要注意周圍情況。盡快搬回岳父母家去。妻子含著淚水點頭。我倆相擁告別！

原來我家在郊區，周圍都是印尼原住民。但我家和他們關係特好，不但見面打招呼，逢年過節也一同搞牌匾慶祝。尤其對面一家，男主人叫伯恩諾，是戴白色北芝帽的長老。按照印尼回教規例，一名回教徒如果去過麥加朝聖，就升為長老，可以換上白色北芝帽，在教會、在村子裏都有一定的話事權，有一定的地位。

伯恩諾和他的妻子，非常喜歡我的大兒子，經常到我家來帶小松到他家去，玩得盡興才送回來。還經常給小松吃東西。因為怕小松腸胃出問題，於是兩家人約法三章，帶小松去玩，不要給他吃食物。這樣我們相處多年儼如親戚。

我到了萬隆，住在張先生家裏。這是個古老的家。房子挺大，還有一些失修的房間，露出斷瓦殘墻。其實張先生是我的總編之親戚。他們一家也把我當親戚看待。他日



常出入的交通工具是一部大型的摩托車，經常給我帶來外面的消息。因此，我很喜歡摩托的響聲。老張是一位教師，又是我報的特約記者，我們很多共同的話題。他身材魁偉，比較沉默，快 50 歲了，還沒結婚。

他的老媽，70 多歲了，慈祥健談。對孩子的婚事，既

擔心又關切，不時嘮叨孩子別忘了婚姻大事。由於老媽媽經歷過日本占領時期的苦難，磨練得她很堅強。她說她是過來人，甚麼都不怕，並鼓勵我說："有老太太在這裏，你不用擔心。"當她知道我有一些麻煩的證件，例如印尼記者證，亞非記者證之後，她給我收了，安頓在殘墻的夹縫裏。因為當局既害怕又痛恨記者。

每天早上，張先生出門時，一聽到引擎聲音，老太太就會把一塊木板鋪在臺階上，讓摩托車順利開出。母子倆很有默契，相依為命。

我每天除了靠老張帶來外面的消息，也買報紙，聽收音機，综合起來和老張分析形勢。生活可以用一句話概括：困守愁城。



作者自拍像

新的开始

大約半個月之後，出乎意外，總編輯來看我，把我帶進一個大戶人家。這裏不僅房子寬敞，而且設備豪華。我們剛坐了一會，主人就來了。他是一位五六十歲的高個子，略為瘦削的身材，三角臉上面有一對眼睛閃爍著慈祥又機智的目光。說來奇怪，我向來不喜歡三角臉，但這次與這個三角臉見面，卻無絲毫厭恶之情。由於藤攬瓜瓜攬藤的關係，轉轉折折和這主人有點親戚關係。說來也巧，他也姓張，我就叫他張公。總編交遊廣闊，與張公是老朋友。他介紹說："小林是我報記者，年紀尚輕，這次走了出來，還請張公多為照顧。"交代之後，因還有應酬他就離開了。

總編剛出門，張公就很認真又像輕意的對我說："小林，你的總編不實在，他沒說清你的真正身份。你是老共的同情者不要緊，你慢慢看就會明白了。"我有點兒忐忑。

張公帶我走進房子內堂，只見一個大大的天井。天井一邊是成排的房間，一邊是一扇 3 米多高的圍墻。奇怪是圍墻腳下滿是肥皂木箱，少說也有二三十個。我心中詫異：這些木箱和房子很不協調。正在遲疑，就給看穿了。

張公說："小林，你是不是覺得奇怪啦。不要小看它。這木箱救了 26 條命啦。"他接著說："26 個老共就是從這裏，踏箱越墻出去的。"我恍然大悟，但又覺得木箱擺著太誇張。這時，他雙手合十像個佛家："我很快就清理，阿弥陀佛。"



我心想這老頭深不可測，且看他今後又如何。我以好奇又期待的心情想看清一個真相。

為了方便和張公見面，我住到張公家對面一個親戚家裡，步行約五分鐘便可到達。這是我妻子的外公外婆家，同住的還有一個二舅和表兄。房子很大，我住在裏間很舒適。外婆特別疼我，天天殺雞加菜，我一下子胖了許多。不久當妻子帶著孩子來探我時，還要給我把褲子改大呢。

我天天往張公家跑。

有一天，張公對我說：“小林，今天不要回家，因為今晚軍隊要清鄉，我們得往外跑。”

清鄉，我怔了一下。原來為了捉共產黨，軍人把城市劃為許多小區，每天針對一個或幾個小區進行。如果晚上清 A 區，下午會先把 A 區封鎖，任何人只能進不能出，晚上就一家家搜查逮捕，就這麼回事。至於清哪一區則是秘密。張公能得到消息，又說明他有能耐。我們中午坐上汽車，向 70 公里之外的井里汶進發。車上只有 3 人，除了我和張公，還有一位開車的增舅。

汽車開至半途，路旁有塊空曠的斜坡，約有幾十平方米，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女人正在嘻嘻哈哈地追逐。車子突然停了，張公與增舅下了車，和那些女人打情罵俏，看去

十分投入。我好像吃著蒼蠅，心中極為兀突。他們見我這樣的表情，很快回到車上，繼續行程。晚上，張公主動找我傾談說："現在我們的身份、環境都變了，生活方式不妨鬆動一些，只要有個原則，有條底線，對工作有益。你若夫子一套，老是一本正經，反而有害無益。以後許多事要見機而行。你現在不是在教書，不是做記者。你現在做的工作比以前教師、記者更有意義，且看你的本事和造化。"這席話使我非常震撼。

過不了幾天，又清鄉了。我們準備上車到目的地去。突然，我發現車頭側的玻璃開了，露出一頂紅帽子。天呀！這不是"渣克拉貝拉瓦"的紅帽子嗎？為什麼總統衛隊來了這裏？我驚奇極了。難怪今天坐的汽車換大了。

不錯，是總統衛隊渣克拉貝拉瓦。戴這頂帽子的正是蘇加諾總統的一名貼身侍衛 XXX 少校。他配上一支無声手槍，到萬隆來搜集情報，和張公見面了。他們好像很熟絡，無所不談。我不了解就一條一條問。張公說："你們記者甚麼都要問。不要問了，我能夠告訴你的，一切都會告訴你。"

紅帽子少校出現之後，我覺得自由多了。中途不少地方要停車受檢的，只要少校伸出頭來，露出紅帽子，汽車便可以暢通無阻，不用停車更不必檢查，還可與少校互相交流，讓我們也知道總統府的動向。

清鄉的情報又來了，我們照常坐上汽車準備走出去。這是一輛高級小轎車，司機位上坐著一位西裝畢挺的中年人，我聽見張公上車時稱呼行長。對，他正是一位銀行行長。上車前張公先打過招呼："今天有客人，大家講話檢點些。"

行長給我們帶來一個震撼的消息。他說，艾迪（印尼共產黨主席）在中爪哇某地一間房的夾墻被殺。遇害時還穿著睡衣。我一時難於接受，從後座挪一挪身子，略靠近前排。頓時車內靜寂下來。行長補充一句說，共產黨崩潰了。

到了井里汶，行長開著他自己的車走了。張公把我叫到面前，肅然問我："你剛才在車上，為什麽要挪動身子？為什麽湊近前排？你犯了大忌，說明你聽到艾迪的消息震驚，至少你關心這個新聞。以後聽了什麽都要置若罔聞，記住，那位行長鬼得很。"這席話使我慚愧得無地自容。暗下決定一定要"謹小慎微"才能萬無一失。

從此，印尼共主席艾地遇害的消息傳開來，還說是他的貼身警衛出賣了他。

艾地的貼身警衛古斯諾。此人與我有一面之緣，據說是全黨最打得的青年，精壯幹練，除了搏擊、柔道冠軍之外，還是射擊的高手。

繼艾地之後，副主席約多、魯克曼等也相繼遇害。

一天晚上，我們回來較平時晚了，我就宿在張家。我們一直暢談到深夜 12 時。這時，有一個人走進大院。定睛一看，是一位中年女人，衣著質樸，步履堅實，配上一頭短髮，顯得文雅利索。

"亞姐！"張公起身迎上前。原來這位就是亞姐，現任大學教授。聽張公介紹過其丈夫就是西爪哇書記，印共中央政治局委員。深夜而來，想必有要事商量。張公和她談開來，我則回房就寢。

五月天了。在這長年是夏，一雨成秋的千島之國，處處樹木青蔥，家家花開似錦。這是一個高級住宅區。因為

是郊外，同樣可以聽到蛙叫蟲鳴。我推開窗戶，望了望外面美麗的景色，突然想起我離家已半年多了。想家、想妻、想兒子、想我周圍的同事和朋友。路在何方？我沉思著。

見了亞姐的第三天晚上，張公很認真地對我說："小林，我們想你去北京一趟，把這裏的形勢發展及將採取的做法告訴查禾多，他是那邊的負責人。如果你同意，一會兒杜東會親自向你交代。"我頗有感觸：我又要走了，這裏將怎麼樣？到那邊又將怎麼樣？一切都是未知數。記得上次去井里汶時，曾到過一個廟宇，據說那邊的神佛特別靈驗，我求了一支籤。籤文有一句說："生不逢時亦圖強。"我很感慨：我生不逢時，而且圖強，是耶非耶！

當晚 12 時後，亞姐陪伴丈夫杜東來了。他是一個中年


攝于 1992 年

漢子，長得較高大，比亞姐高出半個頭。握手寒喧之後，他向我交代工作。這時我才看清楚眼前的風雲人物，是一位道地的爪哇漢子，皮膚略黑，身材結實，面貌的特點是他的鼻子較高（一般印尼人的鼻子較扁平）。他和藹可親，語氣卻很堅定。

他說他不同意艾地發動“9·30事件”，因為只局限在首都。他主張發動群眾，在全國各地同時進行，這樣軍方將窮以應付。他告訴我，他初期打算自己到中國去，會合那邊的同志，在北京連同留學生應該有幾百人。計劃走出的辦法是坐上印尼海軍艦隻出去。該軍艦有自己人，他採取了行動，可是失敗了。杜東抽了口氣說：“現在我們要做好基層工作”，送我走了之後，他將帶領一批同志到農村去。他重覆說，送你走後，立即下農村。這裏強弱懸殊，困難不少。我擔心他的安危，他認為目前應該沒大問題，將來誰也說不準。他還繼續講了好些問題，囑咐我要親自對查禾多同志講清楚。我當時表示，將盡一切努力去完成任務。我們交談將近一個小時，依依惜別！誰知這一別，卻成爲永訣。

我把杜東的材料整理好，寫出3張紙的內容要點，然後慢慢背誦，直至滾瓜爛熟。

魔爪伸過來了

接受任務之後，我躲在外婆家，反覆重溫材料的內容，生怕忘記或遺漏，我試圖在各種惡劣情況發生之後，都保證能把內容完整地表達出來。

那天晚上 8 時左右，我剛從浴室出來，便見婆婆驚慌地從客廳走進來，腳步急而亂。我心一沉，一定有壞事發生了。老婆婆平時做事很有條理，走路平實。她見過世面兼跑過許多國家和大城市，是一位精明可敬的老太太，誰把她驚嚇了。

“孫呀，不好了，有兩個軍人來找你!”婆婆哆嗦著。

“帶了槍?”我問。

“帶了，兩個軍人，他們說是捉逃犯!”

我很緊張，知道事態嚴重，再想深一層，我跳了起來。心想，我如果出了事，這一家子老老少少不就被害死了嗎?天呀，絕不能讓這事發生。我鎮定了下來。鬥智，見機而行，我在盤算著。

跟著婆婆走到大堂。兩位穿綠色軍裝的印尼人站在那裏。打量了他們一眼，我立即看出是萬隆城防部隊，各掛一支手槍。我做記者初期頗多接觸軍人、警察，曾熟讀他們的官階徽號，方便自己的工作。

“我們來捉拿林東賓!”一見到我，其中一個軍人吼了起來。立即將槍頂在我的腰上，面目非常猙獰可怕。

“我不認識。”我從容答道，心里卻說不出的恐懼，心

跳加速。

婆婆見軍人用槍指著我，驚叫道："翁，不好呀！"

另一軍人推開婆婆喝聲："不準動。"喝令她站一邊。這時，我流下眼淚，替可敬的婆婆擔心。

"這是一名逃犯，逃到這一帶很久了。"另一軍人开腔了。

"我不知道，我也不認識林東賓。"我答道。

"那你叫什麼名字？"

"我叫林逢燈！"

軍人接聲說："林逢燈，林東賓字音很貼近。"

我解釋："印尼語跟中文不同，中文名一個字音有別，差之千里。"軍人收起我腰間手槍。

挪步要走了，卻轉過頭來說："今晚你不能走，我們到周圍檢查之後再回來。"我長長地呼出一口氣，兩手抹著額頭的冷汗。

我心想，這次完了，因為：第一我没任何身份證，所有證件都被張婆放在殘墻夾壁中了。第二，如果他們折回，一家子怎麽辦。我默默地收拾了兩套衣服，準備他們到來時跟著走。另一方面，我立即叫妻舅亞植，乘搭連夜往雅加達的小巴，叫妻子設法到"路拉"區政府補領一張身份證，之後立即趕回來。

奇怪，那天晚上那兩個軍人没再來，更令我不解的是：他們當時沒有查身份證。是他們的疏忽？還是我命大？

第二天，亞植帶了我新做的身份證趕回來了。

我拿了新身份證立即到當地政府銷案說，說我因身體不好，來這裏親戚家養病，現在病情好轉，所以我要回雅加達去了。

有一句俗話說：“一重歡喜一重愁。”正是我的寫照。歡喜是回到雅加達來了。愁的是我不能回家、至少在我未了解家裏的情況之前，不能貿然回去。我選定住进朋友敬文家去。

敬文是我的好朋友兼夜校同學。他瀟灑大方，挺有義氣。他是一家中藥材代理商的股東，衣冠畢挺，和靄可親，甚得朋友的喜愛和尊重。他很高興迎接我，還接了我的妻子和孩子來團聚。大家都有說不完的話。

我面臨的問題很多。雖說回大陸去，但我必須選擇去日本。去日本必需有擔保公司和簽證。我於是找到著名品牌粒粒香的老板郭先生。郭老板是我的好朋友，很快就替我辦好去日本的簽證。

其次是張公給我的機票錢，因為印尼盾貶值，只能買到半張機票了。怎麼辦？最後，我決定走一步穩棋。

在兩位學生陪同下，驅車到林紹良先生家。林是印尼首富，他和銀行家陳和景先生、華僑總會副主席郭毓秀先生都是福建福清人。他們不但熱愛自己的家鄉，也熱愛印尼第二故鄉，是雅加達華僑老板的典範。

首富客氣地問明我的來意，立即就付足半張機票的款子。我們很快就離開他家。臨走前我一再致歉，其實我非萬不得已，不想來找他，怕給他帶來麻煩。首富一再說沒問題，還送我們出家門，給我留下不可磨滅的印象。

再見，印度尼西亞

1966 年 5 月 14 日，我登上開往東京的航機，離開雅加達。機場送行的只有妻子、孩子和好朋友敬文。

飛機中途停泊香港，我立即離開機場，棄機退票。幫我辦理退票的是雅加達僑總主席呂俊誠先生的兒子呂良權先生。呂先生夫婦非常熱情接待我，見我擔憂，呂太太一再安慰我，說不要擔心，回去應該好解決的。這是一對璧人，郎才女貌，彬彬有禮，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通過各方面的聯係，我到達廣州，被安排在華僑大廈八樓。這是接待外賓的地方。這時我開始整理材料。

好像是第二天，中僑委一位官員接見我。他自我介紹說，“我姓陳名淵，天淵之别的淵，是中僑委派駐廣州專員。”我表達了此行的目的之後，他要求我把材料交給他。見我有所遲疑，他補充說由他轉交聯絡，叫我等候他的消息。當時我覺得進退維谷。他見如此，又說“難道你不相信我們?”最後我還是把材料交給了他。他還說：“知道你老媽媽還在家鄉，你可以先回家鄉等候消息。”

第三天，他們要我搬離華僑大廈到外面去住，而且說一切費用自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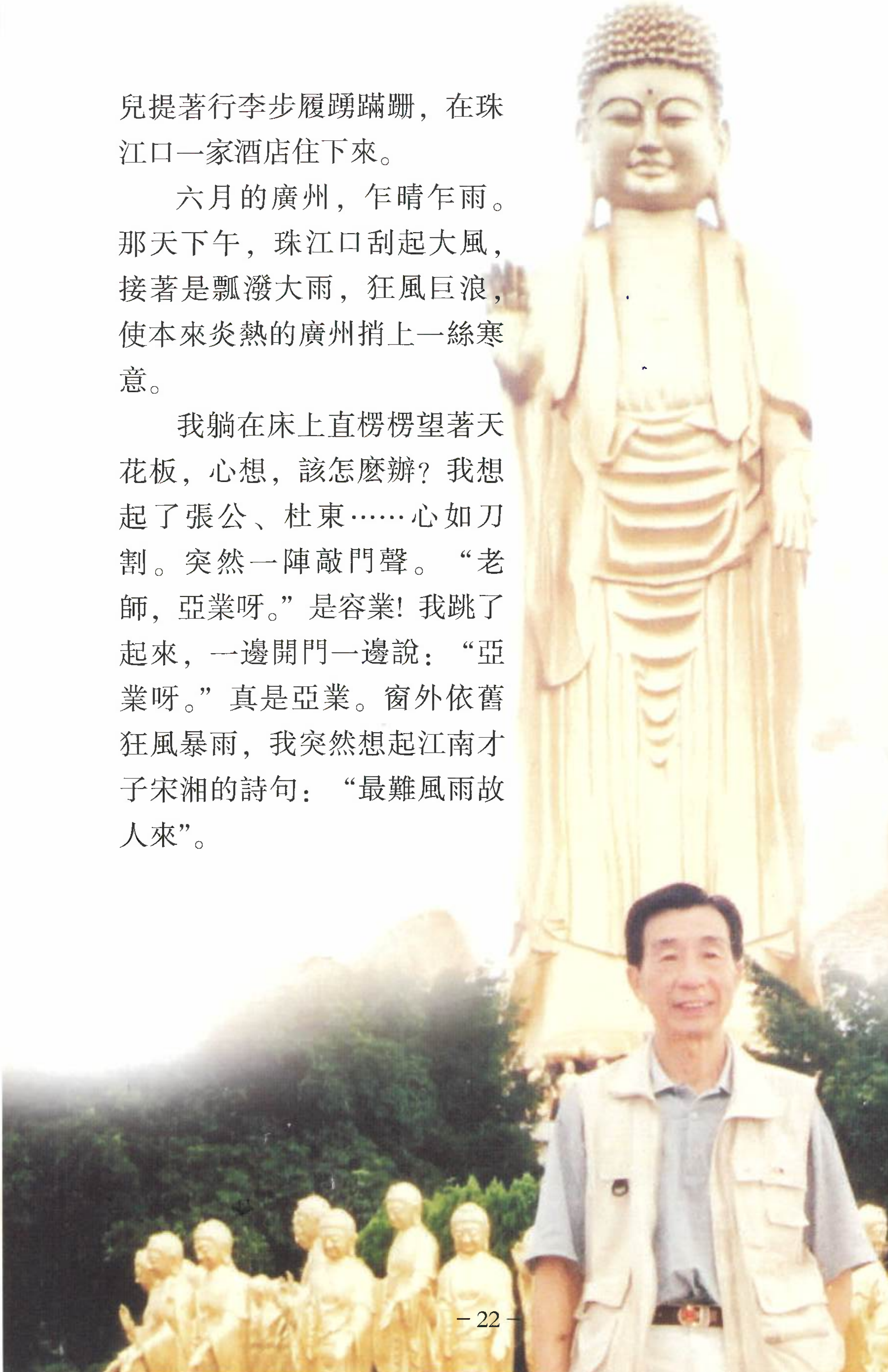
這是晴天霹靂，意味著我不受重視，甚至被懷疑。而且，初時估計可以直上北京，所以沒有多帶旅費，身上只剩下香港呂先生給我的一仟元港幣，說是飛機票的退款。

當時我的情緒極度低落。仿佛從天上掉了下來。自個

兒提著行李步履蹣跚，在珠江口一家酒店住下來。

六月的廣州，乍晴乍雨。那天下午，珠江口刮起大風，接著是瓢潑大雨，狂風巨浪，使本來炎熱的廣州捎上一絲寒意。

我躺在床上直楞楞望著天花板，心想，該怎麼辦？我想起了張公、杜東……心如刀割。突然一陣敲門聲。“老師，亞業呀。”是容業！我跳了起來，一邊開門一邊說：“亞業呀。”真是亞業。窗外依舊狂風暴雨，我突然想起江南才子宋湘的詩句：“最難風雨故人來”。





作者与同事和学生们合影

亞業全名嚴容業，是我在印尼中善學校的學生。我當時住校，亞業與我同床住了4年，當時他讀小學四年級，因1960年印尼排華而回到廣州，現在於一家工廠工作。

這一夜我睡得很香。突然我來到了一間寺廟，留神一看，這不是井里汶嗎？突然觀音菩薩走了出來，揚揚手中的仙水對我說："小林呀，你真是生不逢時呀！將來的路可難走啊，但你正直、真誠、將會感動諸神的！去吧！"我驚醒了，原來是南柯一夢。

農場的遭遇

我先回到家鄉。很快縣政府分配我到蕉嶺華僑農場任文教幹事，俸領國家幹部 25 級。當時 25 級是最低一級，月薪 36 元半。

到農場第一天，我發覺行李給動過了。我想自己堂堂正正，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沒有什麼可怕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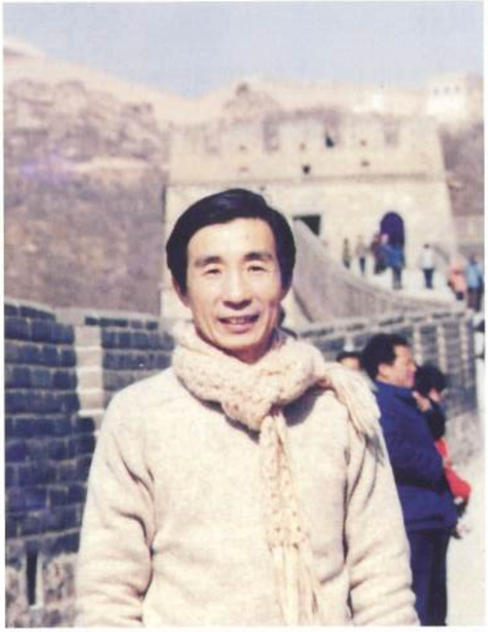
1966 年文化大革命開始了。文教幹事的工作，除了聯係、了解場內中小學之外，最主要的是寫毛主席語錄。我和一些同事還抽調一些教師、生産隊的知識青年、能夠寫美術字的集中一室，天天寫和掛出去，或者到戶外當眼的墻上寫，做好宣傳工作。

期間，我曾到廣州，找陳淵專員，了解轉交印尼之材料的問題。在華僑大廈，見到他時我吃了一驚，只見他衣著簡單，頭上戴著帽子，手里拿著掃把，正在打掃地板。和以前的西裝革履，氣概昂然，判若兩人。按當時的話說，他是被造反派打倒了，正在勞動改造。

專員告訴我，文件（材料）已上交了，但他不在其位，也就過問不了這件事了。我只好掃興而返。

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廣州到處分成兩派，到處有打鬥，互相攻擊。農村也大同小異。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國。

我一直記掛著那份材料，在還沒有送到查禾多手中之前，我的責任還沒有完成。現在陳專員不能經辦了。我將怎麼辦？很快，我作了一個決定：上北京去。



1966 年年底妻子帶著三個年幼的兒子回國來了。在廣州見面的時候，我懷著十分複雜的心情。路在何方。

1967 年寒冬季。北京朔風凜烈，大雪紛飛。我們一家因沒準備棉鞋，全部雙腳都凍腫了。

好容易進到印尼使館，見到了查禾多和其他朋友，其中有一位駐京記者蘇里約諾。見了面大家都很高興，少不了擁抱一番。

查禾多大使說，印尼國內許多組織被給破壞了，杜東夫婦也遇難了。這時大廳裏的氣氛，與其說是沉默、激盪，不如說是悲傷心痛。查大使還說，我們派出許多幹部留學生繞道巴西等南美國家回去，也一一被破獲。他還對我說，如果你能早點上來，要叫我去新加坡設點。現在文革開始，許多事都難於辦理。我絕望了，我想既然這麼多困難難於解決，我不應該給他們添亂。我只好回到農場。臨行前，蘇里約諾代表大使請我們在王府井飯店吃一餐飯。

據我所知，他們後來分散到各國去，查禾多大使則去了荷蘭，壽終異鄉。

我又回到農場。

1968 年農場教師舉行學習班。學習班一結束，我就被扭送公安機關，監禁在看守所，飽嘗了了 5 年 1 個月的鐵窗

風味。

他們監禁我唯一的問題是：你為什麽回來？即是說他們懷疑我回中國是另有目的，是受人派遣的特務。要我老實交代。我反覆交代實情，他們還是不相信。審問我時，法院的人說："你以前是愛國的，對國家有貢獻的，但在'9·30 事件'後你為什麽回來。"我回答說"如果說以前對國家有貢獻，待事實查清之後，你們會發覺我的貢獻更大。"失去自由的日子不好過，蒙冤的時刻更難熬。我要堅持做正正直直的人，不做虚情假义的"鬼"。

你看過"紅岩"嗎？現在我經歷了相同的情節。

我被監禁之後，一直獨囚，講話也沒有對象。一天，牢里插進一位電影人仕。我非常高興，起碼有人交談了。

我和插進來的人相處得很好，無所不談，他也姓林，我們有時還叔侄相稱。閒聊中我曾說，他們不會也不敢判我刑，要等中僑委決定。因為，我的確不受邪惡指使，我所講的一切都是實實在在的。誰知不幾天，在提審我時，法官大聲吼我："你以為自己很了不起嗎？我蕉嶺 30 萬人就可以判你死刑。"這就是說，插進來的叔侄匯報了一切。我沒生氣，照樣和他相處。因為我正正直直，講的都是真實的，可以經得起時間考驗的。

1972 年底或是 1973 年初，看守所人員突然來清倉，檢查"犯人"的衣服鞋襪，寫的讀的一一檢查，連片紙隻字，都要過目。以後才知是林彪事件，引起清倉的迴響。

出獄之後

1973 年，我出獄了，前來看守所接我的是妻子和最小的孩子——小迎。五年多沒見過面的夫妻父子重逢，百感交集。相對無言，孩子叫一聲“爸爸”，我的淚水，就如黃豆串珠般掉了下來。（在看守所，家屬是不準探監的。）

出獄之後，我回到農場生產隊從事種茶工作，和妻子及三個孩子住在一起。感到稀奇的是，每逢家里有親戚朋友來作客時，生產隊長就一定來湊熱鬧，噓寒問暖，關懷倍至。這時我才知道所謂釋放，還是有限度的，即是說我還受監視。我曾兩次向農場保衛科提出申請，要求重返印尼，因為我持印尼護照。我的合理要求卻遭到拒絕。

種茶雖然是旱地作業，但工種繁多，要種茶、施肥、鏟草、摘茶、製茶等等。我初期被分配去鏟草。由於關押了 5 年多，手足酸軟，面色蒼白，面對粗重工作，有點力不從心。幸好妻子經常來幫我。說來也怪，一個從南洋回來，雙手不沾陽春水，從來沒有下過田的小姐，現在成了生產隊的主力。她採茶、種茶樣樣皆精，一肩可挑 100 多斤。由於三個孩子還小，她還要包辦家務。我既慚愧又憐愛和尊重。

一天，我正在河邊鏟草，隔鄰生產隊一個放牛青年，靜悄悄走過來叫我：“林同志！”這稱呼使我又驚又喜。他說：“你受苦了，但你的太太較你有過之而無不及。生產隊天天晚上批鬥她，還要在她脖子上挽幾十斤石頭。晚上



1980年与妻子刘冬慧在香港中文大学留影

鬥爭後，第二天一早又要挑100多斤茶葉上礤背。（礤背是高山，設有制茶廠，離生產隊10華里。）這樣，將來手尾很長呀！太沒人性了。”青年說完之後就施施然離開了。

我的心里像炸開了鍋，既有苦辣酸甜之味，又有波濤翻滾的撞擊。本來在我隻身回到廣州，我感到有暗涌時，曾暗示我妻子暫時不要帶孩子回來，誰知妻子不聽，而且說既然我都回來了，她也只有跟隨，大有“有難同當”之意，我多了一重自责。

1979年文化大革命進入尾聲，鄧小平復出。他提出改革方案，平反冤案、錯案。全國響應他的號召，平反工作如火如荼。我和妻子騎著自行車到幾十公里的梅縣地區要求平反。北京新華社的李勉之先生，聯絡許多記者要求給我平反。全國人大代表古宣輝也寫信給我了解情況，接著他又返梅州家鄉，叫我去見面。在他家見面時，我像見了至親，初時泣不成聲，後來嚎啕的大哭。這個天大的冤案，

淚水沖得掉嗎？抗日時期有篇文章寫道："男兒有淚不輕灑，皆因未到傷心處。"心傷了自然要灑淚。

古宣輝先生不愧是優秀的人大代表。到梅縣見面之後，他回到北京，將我的情況向有關當局反映，又將有關當局的意見寫信告訴我，貫徹中央平反的政策。第二次見面時，古先生表現得較爲輕鬆。他説："給你平反的工作大致就緒，各有關部門都表示同意了。"我説不出的感激。想起印尼一句諺語："錢債易還，人情債永世還不清。"

由於各方面的努力，前輩、朋友們的幫助，加上政府的調查工作取得進展，農場當局決定給我平反。平反大會在場部舉行，有一千多人參加，還決定給我補足被監禁 5 年 1 個月的工資，而且分配我到農場華僑中學教書。

由於 5 年多牢獄生活的折磨，我患上了乙型肝炎、膽結石和胃痛等病症。我和農場商量先養病，不要到學校，以免傳染學生。農場接納了。於是我到廣州養病並切除膽結石。經過一個多月治療，膽石切除了，肝炎、胃痛也有所緩解，我才到華僑中學上班。

我是印尼籍華人，持印尼護照回中國。我熱愛美麗的印度尼西亞，那裏的一草一木，尤其是那勤勞勇敢而又生活艰苦的人民；我憐惜既熱愛自己的祖國，又愛護當地人民的華僑。他們出錢出力建設自己的家鄉，同樣出錢出力建設當地的家園。華僑刻苦耐勞、高風亮節，他們胼手胝足，艱苦奮鬥，直至剩下一堆白骨，長眠他鄉。壯哉，華僑！

孫中山先生曾説："華僑是革命之母"。這是最好的鼓勵和寫照。我想起周恩來總理常引用龔自珍的名句："青山處處埋忠骨，何必馬革裹屍還。[1]"雖然這是總理鼓

注①:清，龚自珍《乙亥杂诗之一》

勵外交人員的話，但對於華僑又是何等恰切呢！

我曾到過爪哇中部一個山莊。那裏有幾十戶華僑聚居在一起。嚴格來講他們是華裔。他們多數不會講中國話，也不識中文，都入了印尼籍。我問其中一位青年，他的家鄉在哪裏。他回答說具體的不知道，只知道在福建，但從來沒有回過家鄉。

他家大堂依然掛著一幅大大的老人像，兩旁有一副對聯，鑲上了鏡框。由於年代久遠，相片和對聯都影蹟模糊了。他指著相片說，這是他爺爺，至於對聯寫的什麽，無可奉告。而他爺爺的墳墓，就在屋後的小山崗，貼近得很。

他娶的是印尼老婆，有三個子女。當然全講印尼話。這是異國一家，中印一家。

夕陽西下，山色蒼茫，這古老的相片，模糊不清的對聯，和這中印合組的一家子，語言動作，膚色長相，使我浮想連翩，徹夜不眠。異國他鄉不就是故鄉。在印尼的窮鄉僻壤有多少這樣的家?！有多少這樣的華人?！

當時印尼政府正在排華。我深深感到中印一家血肉相連，排華不正是排斥自己。失敗是註定了的。

可敬的前輩

平反之後，北京的李勉之先生介紹我去中新社工作，他跟社長張帆先生打了招呼，社長答應了。但是情況突然起了變化，我不能上京了。

大約在 1980 年的夏天，我接到廣州一位學生來電說，方紀同志到了廣州，在一家醫院療養，叫我盡快到廣州，也許還能見面，遲了他可能回天津去了。

我立即趕到廣州。

在醫院的病榻前，我發覺一位熟悉的身影，一米八的個子，畢挺的鼻梁，寬闊的前額上，斜掛著粗粗的短髮。他就是名作家方紀。



方纪右手被打跛后苦练左手写字，这是他的题词

他躺在病床上閉著眼睛，顯然他沒發覺我的到來。他大聲地發出“掏掏掏掏掏掏”特有的呻吟聲。他半身不遂，右手和右腿不能動了。他受到嚴重的摧殘。(後來有機會談起，方太太告訴

我說，老方是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江青打至殘廢的。）惡毒的蛇蝎！我暗暗地罵了一聲。

“方紀同志!”我輕輕叫了一聲。

“小林，你來啦!”他睜開眼睛，帶點驚喜。

我問候他的傷勢和治療的進展，也向他反映自己平反的情形。

“小林，今後打算如何?”他關切地問。

我告訴他，準備去北京中新社工作。我想他一定會高興並且贊同的。

“錯!”他提高音調，大吼一聲。我當時呆住了。“方紀同志，我不明白你的意思。”我大惑不解，直楞楞望著他。

“很簡單，我以前可以在總理身邊工作。現在連農場都不相信你，你還不走啊?”我恍然大悟。

方紀同志接著說，廣東省公安廳副廳長老白，是他的老戰友，明天他乘航機返天津時，老白也來幫他擡擔架。





在方紀先生家作客

到時他會把我的情況告訴老白，請老白辦理我的出國手續。方紀同志叮嚀我："回家之後，好好準備一下吧。"我點點頭，心潮翻滾，感激莫名。

時間追溯到 1963 年，中國作家代表團訪問印尼。代表團由五位名作家組成：楊朔、方紀、杜宣、司馬文森和黃鋼。當時我負責接待工作，天天和作家們接觸，自然就認識了。

有一天，我和方紀同志見面時，他突然問我，做什麼工作。我說，我是一位教師，也做行政工作。他問我教中學還是小學，教什麼科目。我說，我教書的學校是一所中小學，我教文史地，主要是中國語文。"那你看過哪些書？我們這些代表的作品有沒有看過呢？"我回答說："有呀，比如楊朔同志的《三千里江山》、杜宣同志的兒童劇作品，還有你的名作《揮手之間》……"他突然轉了話題問：

“這裏的中學生中文程度如何?”

這個問題挺難答，高低拿什麼做標準呢？我只好說：“程度如何我說不準。但印尼華僑學校校風純樸、正派，學生的上進心很強。我教書 10 年了，這點我深有體會。

作家們又要出發了，話題也就終止了。

這時我深深感到，他是一位可敬的長輩，關心群眾的好作家。公幹來到異國他鄉，也不忘懷華僑，關心華校學生的文化程度，令人肅然起敬。

文化大革命時他受盡折磨，我同樣受到沖擊，不期然心貼得近些。他永遠是我可敬可親的前輩!

山水有情

在作家代表團來訪前後，我還接待了前來參加國際會議的工作人員，包括翻譯等。他們是一批國內的精英。華僑社會盛傳，這些傳譯、翻譯人員熟悉多國語言，傳譯有如走跳板：準確、流暢、利落。其中接觸較多的是何振樑先生。他年輕、長得又帥、文雅淡定，一副外交家形象。


晚年时期何振樑先生

有一天，何先生向我表示頭髮長了，想去理髮。要是平時，這只是小事一樁。但是當時的情況，我不得不考慮他的安全，因為當時華僑社會龍蛇混雜，兩派沖突，不時仍有事件發生，萬一他有意外，立即成為國際要聞，這是誰也不願看到的。

我再三考慮之後，打電話給一個朋友——傅金美。他是商業區“班芝蘭”一家理髮店老板，彼此熟悉，正直可靠。在我說明情況之後，他立即表示到他店裏去，由他親自為何先生理髮。我高興極了。我們到他的理髮店時，受到他和工友熱情接待，理髮問題也就迎刃而解，我們非常感激！

何振樑先生後來任中國奧委會秘書副主席。其後又當選國際奧委會副主席等重要職務，名揚四海。為中國和世界體育事業作出了卓越的貢獻！

有一個小插曲：在我接待何先生一行時，曾經帶領一批中三學生探望代表團成員。學生們很高興，準備了紀念冊、相機等，要求簽名和合照。會面情況融洽、熱烈。回到學校時，幾位學生問我：是否北京人比較白皙，又贊揚說，代表們都很慈祥、和藹可親。

代表團離開雅加達返國時，記得是搭乘輪船從海口芝靈津起錨。那天海口擠滿了華僑，其中更多的是學生，他們唱起了歌："唱起我們的歌來，不要為別離而悲傷……"整個海口洋溢著離情別緒。第二天，當地報刊登出幾張相片。其中一張兩位穿著校服的學生，卷起褲管，站在淺海中揮手告別，看情況，他們都在嚎啕大哭。

揮淚告別，常有；放聲大哭送行，則為罕見。這是印尼華僑一景。

來到香港

1980 年 7 月 26 日，我一家 5 口告別了至親，告別了農場許許多多愛護我的華僑，途經深圳來到香港，陪同我們的還有一位梅縣地區第七科科長。在深圳握別的時候，我衷心向科長致謝！

由於護照過期，我不能回到印尼去，只好在香港定居下來。

在香港定居後，我一家 5 口，除了最小的孩子上學之外，4 個人都外出工作。（最小的孩子才 13 歲），我向親友借了 8 千元。在大磡窩村買了一間木房。誰知不到一年，一場大火毀了我的家園。我們住進了深水埗難民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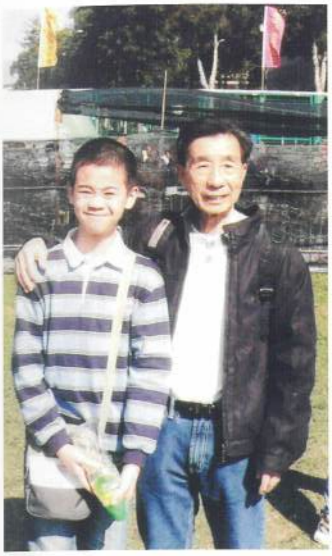
作者夫妇和三个孩子、媳妇





接著政府安置我們到圓洲角臨時房屋。第二年我們清還了親友的債務，還以分期付款方式買了大埔中心一間房子，不久又買了一間同樣在大埔中心的兩房一廳小單位。一家的生活開始安定下來。

左图：作者与大孙晧晧和樂樂



2011 年 1 月作者和孙子熙熙



长子与次子



1996 年，作者 80 多岁的老媽媽王氏与曾孙儿樂樂留影



最小的儿子一家

我和妻子

1986 還是 1987 年，深井麗都花園發售，我和妻子實地看了環境和圖則。妻子十分喜愛，慫恿我買下來。當時我開玩笑地說："我是屬雞的，雞入深井不是很好吧！"她說："那就在深井搵食吧。"由於她特別喜歡麗都，於是就在麗都買了一個單位，誰知這裏成了我一個轉捩點、傷心地。

1990 年麗都入夥以後，我們一家就住在那裏。由於位置較偏僻遠，所以屋村準備了接駁車來往深井和荃灣，方便居民出入。

就在這個時候，妻子突然作出了一個不尋常的決定：辭去原本在韓國汽車輪胎公司的文員工作，轉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做女工。她說：醫院每星期有一天半的假期，可以多陪我和孩子。我說醫院比較辛苦，考慮一下吧。"不用考慮，能陪你和孩子，什麼都值。"她斬釘截鐵地回答。

從此，每天下午只要我有空，就會坐上接駁車到荃灣接妻子。只要一看到我，她就會張開雙臂，快步地走過來，相擁在一起。她這個姿勢，這種神情一直到現在都深深地烙印在我的腦子裏。

她是土生的印尼華僑，生長在中等家庭，過著小康生活；她秀外慧中，樸實大方，人緣特別好，從來不出惡言，善待別人。但是回國之後，丈夫被監禁了，自己要負擔沉重的體力活，晚上還要挨鬥爭，頸項掛著大大的石頭，挨打受辱；第二天一大早，又要挑百斤茶葉上山崗，更有那只有 5

歲、3 歲和 1 歲的兒子要撫養，縱使是鐵人也要崩潰！

她非常疼愛孩子，每每餵孩子吃奶、吃飯都花上半個小時，甚至更長時間，以致自己吃的都冷了，但照樣吃。我妹妹常來我家，看到這種情況很心疼大嫂，多次勸她要照顧身體。她愛孩子但不放縱、不溺愛，對孩子有要求、要他們做好功課，和做力所能及的家務。


夫妇游澳门

在我眼中她是完美的妻子，可敬的女神！

1991 年妻子病倒了，住進了播道醫院。我每天去探病時，一顆心又疼又亂，走在醫院附近的街道時，一邊不停地手舞足蹈，一邊唱着歌，疯疯癲癲。一天，一個長者見到這樣，走近我瞄了一眼說："斯斯文文，可惜瘋了。"

一天下午走進播道醫院，護士姑娘迎着我說："林先生，你太太不要我們幫她冲涼，她要你替她冲，你搞掂她吧！"我回答說："好的，以後都由我幫她冲涼就是了。"護士姑娘說："原來你倆感情這麼好。"我說："也許她不習慣吧！"

在播道醫院，確診她患上癌症。醫生說，她整個腹部都是癌細胞。大概只能活半年吧。我的心碎了，我想老天爺對我實在不公平，受那麼多苦，還要搶走我的妻子。我全家籠罩着愁雲慘霧。

妻子轉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她提出要去廣州中山醫學院治療，因爲那裏有她的一位堂姐，她是醫院某部的負責

人。我一口便答應。

於是我提出送妻子去廣州，但她的主治醫生卻一口拒絕。醫生説：“廣州各方面的條件並不比我們好，在那邊還要花不少錢，怎麼行呢？”

我深深知道醫生完全出于好意，而且説得非常有道理。但是，我必需説服醫生，請她放行，因爲我要完成妻子的心願。我説：“醫生，你應該了解病人家屬的心情的。這個時候，妻子只要求我去廣州，即使要求我送她去美國，我也會賣了房子送她去。我只想完成的她的心願。”最後，醫院答應了我的請求，給妻子出院，還派車送我們到紅磡車站。

在廣州住院期間，印尼的妻弟來了，家鄉的妹妹也來了，他們專程來侍候病重的親人。可是藥石無靈，妻子在那邊撒手人寰，全家嚎啕大哭，一片淒風苦雨。悲戚之情實難以筆墨形容。臨終前妻子囑托：“老二、老三還沒結婚，你要好好替他們辦妥婚事。”我含著淚重重地點頭：“你放心，有我在一定辦妥！”

處理好妻子的身後事，我又回到深井的家。家，一切都變了，以前的溫馨，現在變得冰冷陰森，可怕極了。我一踏入家門，就感到頭痛暈眩。那門窗、那被褥、枕頭好像都撅著嘴向我怒吼，我住不下去，貼出一張貼子，賣出這間房子。我減價 20 萬給第一個買家，很快房子就賣出去了。人們說我瘋了，我說，人都死去了，錢又有何用？我有點失去理智。接著我又賣去了深圳的房子。最愛的人走了，我遊戲人間也！

正是：凄風苦雨家猶在，愁雲慘霧心難安。

現在的生活

我住在清河邨。這是新界北部一個新型的公共屋邨，步行到上水火車站約需十五分鐘。邨後有一條小河，據說就叫清河，清河邨也因此得名。

所謂清河，其實只是一條小溪澗，平时流水潺潺，只有在下大雨時節，小溪暴漲成河，河面有三、四公尺闊。但易漲易退，小河也经常改容。别看它只是小溪，却经常有魚兒遊來遊去。

河兩岸有許多樹木，這儿空氣清新，河邊還有一條長約二百多公尺的水泥路，男女老少村民都喜歡在這里晨運、鍛煉身體。

我和四五位長者朋友，每天上午都在這兒散步、聊天、一待就是一個上午，相處得好，樂也融融。熟絡了的長者朋






清河村一群常聚一起的的长者朋友

友彼此交換電話，偶有人缺席，就會互相問候；有人住院，大家會去探望，像是兄弟，也像親人，日子過得更開心。

我們不只限於小圈子的守望相助，比如鄰村有一個住木屋的鄒伯，97 歲了，天天推著輪椅經過清河邨去吃飯、買日用品。最近幾天不見他出入，我和老曾就去探望他，一連去了三次，只見他家重門深鎖。鄰居說他住老人院了。原來他在家跌倒進了醫院，病情好轉後，進老人院了。我們又去老人院探望他，他很感動，說話不清他卻翹起拇指，表示贊賞。

呂伯，全名呂伯修。一位 70 多歲的長者，由於早年中風延誤治療，後來又做了心臟搭橋手術，腿腳不便，健康較差，時常進出醫院。

但他堅持鍛煉，每天步行。8 年前，我在清河邨認識他之後，彼此坦然相待，成為無話不談的朋友。

他是一位畫師，憑著他畫畫的造詣和毅力在深圳買了



长者朋友合影，左一为吕伯修



长者朋友合影

兩套住宅單位。可謂成績亮麗。

去年秋天，亞呂又住院了，我和長者朋友探望之後，認為他的情況不佳。於是我隔三岔五去醫院看望，後來每天都去，上下午都去，哪怕看望他一眼都好。

突然，亞呂由北區醫院轉到威爾斯親王醫院去了。

第二天，他那與我素未謀面的太太來電話給我說："亞呂走了（辭世了），感謝妳對他生前的關心。"

我聽得出呂太很傷心。我無言安慰，只是說："不用謝，關心亞呂是我作為朋友之義。呂太，節哀順變，妳好好保重！"

我們之間非親非故，但是彼此都是長者，，就是本著老吾老，以及人之老的精神罷了。信手拈來一首打油詩：

喜逐朝霞小溪林，
魚躍鳥語伴晨曦；
老來倍惜親朋樂，
半醉半醒傲餘年。

